

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十九輯

11.3
50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文史資料出版社

編輯 凡 例

一、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資料，并推动撰写資料工作的开展。所选的資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選輯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二、本選輯所选的資料，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个方面，不拘体裁，只要有史料价值，均可选入。

三、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欢迎閱者提出补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我第三次做皇帝.....	爱新觉罗·溥仪(1)
南次郎与熙洽密谋建立伪满政权的经过.....	王稔五(28)
吉长汉奸傀儡登场纪实.....	金名世(37)
我所知道的日满议定书附件的内容.....	阮振铎(50)
伪满日本官吏的秘密手册.....	王子衡(56)
日寇在伪满进行掠夺的三光政策.....	王子衡(61)
所谓“北边振兴计划”的内幕.....	谷次亨(82)
伪内蒙古自治军始末.....	正珠尔札布(92)
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记要.....	李泰荃(100)
内蒙德王和蒋介石的关系.....	陈绍武(114)
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和解体.....	张炳如(139)
日本外务省就汪伪政权成立经过向内阁的报告	杨凡(译)(174)
汪伪巨奸派系之争.....	何国涛(182)

附 注:

对《我第三次做皇帝》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五十一辑
二七四页

对《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和解体》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
第四十八辑二五三、二五四页

我第三次做皇帝*

爱新觉罗·溥仪

“重登大宝”和初次訪日

“……京津旧臣，聞皇上就任執政，疑尊号自此取消，同深悲憤。即曾迁民国官吏如曹汝霖、汪荣宝等，亦以名义关系甚重为言。臣以皇上屡次坚拒，及最后不得已允許之苦心，詳为解釋，聞者始稍知此中真相，而終无以尽祛其疑。……”

这是我就任“執政”一月后，請假回津的陈曾寿寄来的“封奏”中的一段。来自京津的类似的封奏还有好几件，都曾引起过我的无限煩惱。

按照約定，我当“執政”一年期滿，如果关东軍不允許实行帝制，我是可以辞职不干的。胡嗣瑗和陈曾寿早在滿期前两个月，就劝我催促关东軍履行前約，他們认为关东軍必不肯舍得我下台，因此是会接受帝制要求的。我没有照他們的办法去“将”关东軍的“軍”，我早已没有这样的胆量；而且万一关东軍让我辞职，我能到哪儿去呢？所以煩惱归煩惱，对关东軍的順从还是要順从。

在将近我就职一周年的那一天，在一次和武藤的例行会見中，出乎我的意料，他先向我提起了这个問題。他說，帝制的問題在日本

* 本文是作者所著《我的前半生》（未定稿）中第六章的几节。

还正研究着，意見尙未一致。据他看，到时机成熟时，这个问题自然会解决的。听了他的话，我自然就更不去想什么辞职不辞职的事了。

比我还着急的人倒有的是。除了胡嗣瑗、陈曾寿之外，郑孝胥、熙洽等人也忘不了这件事。郑孝胥在1933年的重阳节写过一首詩道：“雪后重阳夕照明，高台纵目俯神京。平原已觉山川伏，投老翻教岁月輕。燕市再游非浪語，异乡久客独关情。西南豪杰休相厄，会遣遺民見后清”。他不仅要在滿洲行帝制，还想着回燕京，实现“后清”的幻想。熙洽不只是幻想，而且在我就职一周年时还有实际行动，他指使手下一名心腹叫林鶴泉的，借长春一个小学校的地方召集了一个五百多人的會議，到会的有滿族“遺民”，也有前东三省国會議員，在會議上通过了一项“請求实现帝制”的決議。这个会沒开完，就叫日本宪兵給冲散了。但是关东軍司令长官倒也沒发脾气，却找了他去解釋說帝制非不可为，不过是时机未至而已。

究竟时机什么时候来呢？我很想早一点知道。曾陪我到东北来的日本人工藤鉄三郎，我的“侍卫处长”，这时他表示愿意为我到东京去刺探一下。我觉得这个日本人对我很好，我在旅順时，有一次发现茶水变色，疑心有人下毒，叫人去化驗一下，工藤拿起这杯茶，一仰脖喝了下去。这个举动使我相信他的忠心，于是賜改他的名字为工藤忠。現在他又提出这样主意，我自然十分高兴，就把这个刺探时机的任务委派了他；并嘱咐他从側面去活动，千万不要說是我派的。他到东京去了一趟，找到了南次郎，他探得来的消息虽非十分理想，也还是乐观的。据他說日本軍部方面大致上同意实行帝制，实行的日期也不会太远了。

究竟时机是指的什么呢，我始終也沒弄明白。这年的3月2

日，日軍已完成了东北四省的全部占领；3月24日，国联通过一項“宣布日本为侵略者”的決議；27日，日本退出了国联，宣称再不受什么約束。5月31日，长城战役以塘沽协定宣告了結束，划定长城以南的非武装地带，中国軍隊奉命全部撤退了。在我看来，这些叫每个真正的中国人都不胜憤激的事件，都是做皇帝的时机，但一个的都过去了。一直到“时机”真地来临，继任的关东軍司令菱刈隆在这年年底突然告訴郑孝胥說，日本政府可以承认我做皇帝时，我也沒弄清楚“时机”是个什么东西。我由于过分地高兴，也沒有心思研究它了。

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准备一套清朝皇帝的龙袍。我把帝制的实现，是看做走向大清复辟的起点的。在日軍发动长城战争时，我就幻想过由日軍替我把“大清疆土社稷”全部恢复过来，送我到北京重登大宝。后来听说打到密云就停了战，心里很是不滿意。这时我又想，我先把清朝皇帝的架子准备好，将来我必能走进我的紫禁城。誰知这套龙袍刚从北京敦庆隆买来(旧的全沒带出来)，就出了岔子。关东軍派了人来告訴了郑孝胥，說日本承认的是滿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皇帝登极不能穿清朝衣服，要穿关东軍指定的礼服，即陆海軍大元帅服。

我这时又忘了日本人批准的皇帝身价，忘了日本人所以要实行帝制，不过为了好利用“皇帝”的名义更省事地統治这块殖民地而已。我的脑子只顾发热，就不知天高地厚地一定要郑孝胥給我向关东軍去交涉，非得穿清朝服制不可。陈曾寿这时曾提醒我說：“皇上要爭的不該是衣服，倒是應該把君主实权和关东軍說好，如果有了实权在手，就是学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未尝不可。”可是在脑子发热的时候，清朝袍褂——我从小看慣穿慣的服制，就像童

話里的法宝似的那么代表权威，好像有了它，什么实权、威风就会一齐来到我身上一样，因此别人的話我全听不进去。

結果，挨了关东軍一个硬釘子。关东軍坚决表示，登极典礼非穿指定的制服不可，这是没有什么商量的。最后，只允許在祭天的时候，穿一次清朝袍褂。我看实在没办法爭了，才又有点清醒过来，明白了皇帝的称呼本是人家賞的，再爭下去說不定連皇帝也当不成了，也只好答应下来。3月1日这天，在长春郊外一个叫杏花村的地方，在临时垒起的一个土坛(代替天坛)上，举行了告天而后即位的祭天古礼。我总算穿了一次龙袍，过了一次癮。

举行过登极典礼(1934年3月1日)之后，日本天皇派来了他的弟弟秩父宮雍仁为代表，前来祝賀，并且給了我日本大勳位菊花頸飾和菊花大綬章，給了婉容(我的皇后)一个宝冠章。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日本人的这些举动，又让我飘飘然忘其所以。如果这是我的那种情緒的起点，那么到1935年4月，我到日本回拜天皇时，則是到了高漲的頂点，也是我的美梦最濃的时刻。在这个美梦里，我把自己看做是和日本的裕仁的兄弟輩，认为开始“时来运转”了。

其实这次訪日，全是关东軍安排出来的。他們說，为了答謝日本天皇派御弟秩父宮来对我“即位”的祝賀，也是为了对“日滿亲善”的躬亲示范，需要这样办一办。

日本政府以樞密顧問官林权助男爵为首組織了十四人的接待委员会，派了战艦比叡号来迎接和白云、丛云、薄云等舰护航。我从大連港起舰时，又有球摩、第十二、第十五驅逐舰队接受我的檢閱，到达橫濱港时，又有百架飞机編队的欢迎。……記得我在这次暈头轉向、受寵若惊的航程中，写下了一首諂媚的四言詩：

海平如鏡， 万里远航。

两邦携手， 永固东方。

在航行的第四日，看了一次七十条舰艇的演习，又在量船嘔吐之中写下了一首七言絕句：

万里雄航破飞濤， 碧蒼一色天地交，

此行岂仅覽山水， 两国申盟日月昭。

总之，还未上岸，馬屁先拍过去。因为我不仅对日本所示之威力深感惊异，我还把这看做是对我真心尊敬，真心帮助。过去的一些不愉快，只怪自己誤会了。

到了日本东京，裕仁亲自到車站迎接我，为我設宴，然后又是向我住所回拜。我接見了日本元老重臣，受他們的祝賀，同裕仁一起檢閱了軍隊。我也跑到他的家庙“明治神宮”去参拜，給他爸爸“大正”上坟。我到日本陸軍医院慰問那些侵略中国挨了打的伤兵伤官，又到裕仁的母亲那里，献献殷勤。日本报纸曾报道过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說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搀扶了日本皇太后，这和我在长春宮内府中，搀我父亲上台阶是一样心情。其实，我还从来没有搀扶过自己的父亲。如果問我搀扶裕仁的母亲的心情，坦白說，那純粹是为了巴結。

离东京的那一天，雍仁代表他哥哥裕仁在車站向我送別，他致欢送詞說：“皇帝陛下这次到日本来，对于日滿亲善，是有重大貢獻的。我国天皇陛下对此感到非常滿意。务請皇帝陛下抱定日滿亲善一定能做到的确实信念而回国，这是我的希望。”

我就又用了那种巴結的心情回答道：

“我对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国民的热誠欢迎，实是感激已极。我現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全力为日滿的永久亲善而

努力。我对这件事，是抱有确实信心的。”

临登船出发时，我向担任接待的林权助又讲了一遍。临了，我请他代向日本天皇和裕仁母亲致谢，提到裕仁母亲，我居然两眼含满了无耻的眼泪。而且这样一弄，把那个老头子也给逗哭了。回想起来，一点中国人味也没有了。

总而言之，日本皇室这次对我的招待，使我头脑更加发热，感到自从当了皇帝之后，连空气都变了味。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逻辑，天皇与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满洲国的地位。日本人对我，当如对其天皇者同。

在这种飘飘然中，我回到长春，立即请来新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南次郎大将，向他发表了我的感想，次日（即4月29日）又到南的住宅，兴高采烈地参加了裕仁的生日的庆祝会。再次日，我便急不可待地下谕，把在长春的所有简任职以上的官吏，不论中国人日本人全召来，听我训话，发表访日感想。我在事先全没有和日本人商议，我也没预备讲话稿，人到齐了，我便讲开了。我讲了访日的经过，绘形绘声地描写了日本天皇对我的招待，讲了日本臣民对我的尊敬。最后我说：

“为了日满的亲善，我一定拚命去干。因此，我认为：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也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的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国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

在5月2日我还颁布了“回鑾训民诏书”，那是由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远藤柳作授意，郑孝胥起草的。

朕自登极以来，亟思躬访日本皇室，修睦联欢，以伸积慕。今次东

渡，宿愿克遂。日本皇室，恳切相待，备极优隆，其臣民热诚迎送，亦无不殫竭礼敬。衷怀铭刻，殊不能忘。深维我国建立，以达今兹，皆赖友邦之仗义尽力，以奠丕基。兹幸致诚悃，复加意观察，知其政本所立，在乎仁爱，教本所重，在乎忠孝，民心之尊君亲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诚意为国，故能安内攘外，讲信恤邻，以维持万世一系之皇统。朕今躬接其上下，咸以至诚相结，气同道合，依赖不渝。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则大局和平，人类福祉，必可致也。凡我臣民，务遵朕旨，以垂万福。欽此！

关于这篇充满奴化毒素的伪诏书的出现，也曾有种种“非个中人不

人不易得知”的内幕。那就是我这次到日本，从东京游历了京都、奈良以后，到了须摩的“武库离宫”，准备回东北前，当时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远藤柳作对我说，在“回国”之后，应当发表一篇“诏书”来表示对日本的感谢，并要把这种精神传告于“全国人民”。（从这里更可以看出伪诏书的颁布，已早经日本关东军和政府军部内定。）当我回长春以后，果然郑孝胥便拟出了这一“诏书”的草稿给我看；同时专门操纵我的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岡安直也替我出主意，说道“在这‘诏书’里面，该当添上‘依赖不渝和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的字样。”于是我亲笔加上那几句话。吉岡说要写成“依存不渝”，后来因为郑孝胥说这话不通，结果将“存”改为“赖”。从此以后，伪满的司法和警察机关就有了治罪的一条，叫做“破坏依赖不渝”或“违反与友邦一心一德”。

我从这次对各伪大臣、参议讲话以后，再没有过这样的随便讲话，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至太平洋侵略战争后，对我限制一天比一天严。关东军指定我会见的人，除了每周一次向我报告“国务”的总理大臣、参议府议长之外，其余的“大臣”们后来只有每年末规定的“政务”上奏（这时还有伪总理张景惠的侍立）和在

伪宮举行的形式上的參議府审核年終預算會議以及逢年过节举行庆祝时見見面，再不能如以前的随便来見我。到了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限制的就更严，連我見亲属也受到限制。我的亲属除了在长春的妹妹、妹夫和留在“內廷”念书的侄子們之外，关內亲属只准关东軍指定的几个人来看我。其他凡是从华北来的不論是亲属或常亲属都只能在年节与我生日时向我庆祝时行礼，不許个别談話。这是由吉岡安直写在条子上交伪宮內府大臣熙洽照办的。另外“帝宮”里还住着几个日本宪兵，来往人是瞞不过他們的眼睛的。这几个宪兵穿着非日非滿的特制的墨綠色制服，他們的屋門口有一个木牌，沒头沒脑地写着三个字：“宪兵室”。

最重要的，是一个过去有事才来、无事不来的关东軍參謀吉岡安直，有了一個“帝室御用挂”的新官銜，成了每天有事无事必到的关东軍代表，我的一切举动都必須在他的指导下进行。

吉岡安直的高压电綫

关东軍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岡安直就是傳导性能良好的电綫。

这个高顴骨、小鬍子、矮身材的日本鹿儿島人，从1932年起来到我身边，一直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和我一起被苏联俘虏时止，始終沒有离开过我。十来年間，他由一名陸軍中佐，步步高升到陸軍中将。起先，他的身分只有关东軍高参，从1934年起又增添了一个“滿洲国帝室御用挂”的官銜。这个官职是日本的名稱，据說意思好像是“內廷行走”，又像是“皇室秘书”，究竟应当譯成什么名称合适，我始終也沒有認真去查問过。这也沒有什么关系，因为它的字面含意無論是什么，都不会說明吉岡的实际职能的。他

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不过这职务一连干了十几年，也必须要有他的本事。

有的书上說，吉岡是我在天津时的好友，后来他当了关东軍參謀，正好这时关东軍要选一名帝室与关东軍之間的“联络人”，以代替解职的侍从武官石丸志都磨，认为他最合适，因此当选。事实上，我在天津时有一段时间，經常听他給我讲时事，談不上什么好友，他被派到我这里当“联络人”，也不是先当了关东軍參謀才恰逢其时的。如果說他是溥杰的好友，倒有一半是真的。伪滿成立以后，溥杰进了日本陸軍士官学校，吉岡正好在这学校当战史教官。几乎每个星期日，吉岡必将溥杰請到他家作客，殷勤招待，培养了“友情”。这样时间不久，溥杰就听吉岡透露出了，关东軍有請他到我这里任职的意思。那时他曾表示，如果他不作为关东軍的高級參謀而来到滿洲，他就不想干，因为忠島比多吉（任“执政府”的諮議）和石丸志都磨都由于沒在关东軍里扎下根，所以全沒站住脚。

后来，他果然以关东軍高参的身分来到我这里充当“联络人”来了。他在未上任之前，先請溥杰到他家去作客，請溥杰写信把这消息告訴我，并且說希望我能預先为他預备好一間办公的屋子。我接到溥杰的信，因为早知道他对溥杰的殷勤照顾，九一八事变前他叫溥杰透消息給我的事当然我更不会忘記，我觉得吉岡对我不坏，于是欣然照办，在他还没到长春之前，就給他把屋子預备好了。这件完全多余的举动，过了許久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他这是有意給关东軍看的。他在关东軍眼里既有和我的不平凡的关系，在我的眼里以及其他“日滿官吏”眼里又有关东軍高参这张老虎皮，自然就左右逢源，得其所哉了。

吉岡很喜欢画几笔水墨画。有一次他画了一幅墨竹，請郑孝胥

題了一首詩，又請我題了幾個字（什麼字，早已忘了），然後帶到日本，送給了裕仁的母親——日本皇太后。不久，這幅畫在日本報紙上刊登了出來，並稱譽吉岡為“采筆軍人”。吉岡的藝術聲名是否就從這次出現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指望這幅畫帶給他的，並不是什麼“采筆軍人”的稱號，却是比這稱號更有價值的，位於日“滿”皇室之間的身價。我從日本訪問回來，日本皇太后和我經常不斷互相饋贈些小禮物，自然，“聯絡人”就是這位吉岡。從那次他送了墨竹之後，東京與長春的往來就更繁了。

他大約每年都要往返東京幾次，每次臨走之前，總要叫我做點點心之類的食品，由他帶去送給日本皇太后，回來時還帶回日本皇太后的禮物，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日本點心。那位老太太和我都閒着沒事，我們又都有現成的作點心的師傅，彼此送來送去也都不費什麼事。不過由於我的疑心病，吉岡每次帶回來的點心，我總是叫別人先吃，我才敢吃。

當然，吉岡每年一次往返於日“滿”皇室之間，這決不是他的擅自專斷，但每次往返的內容，我相信主要是由於他的獨創設計。比如有一次，他看見了我的四用聯合收音機，忽然像發現了奇跡似的問我：

“這個機器也能 Record（錄音）？”

他的中國話不大好，但我們交談起來還不困難，因為他還會點英文，程度和我也差不多，我們平時就在中國話里夾着英文，同時又用筆談幫忙，倒也能把意思說清楚。

“Record 是大大的好”，我說，並且拿出一片錄音片試給他看。

“好，好！”他高興地笑着，看我安好片子，便說，“我教陛下几句日本話說說吧！噫！——我祝天皇陛下身體健康！……”

我照他說的日本音說一遍，“我祝天皇陛下身體健康！……”這句話錄到唱片了。他把那唱片放送了两遍，滿意地拿了起來。

“好，這次我到東京，嗯！把它貢給天皇陛下！”

吉岡說話，總帶幾個“嗯！哈！”眼眉同時一挑一挑的。這個毛病，越到後来越多，我覺着越不受用。和這種變化同時發生的，還有他對於我們之間的关系的解釋。

1934年我訪問日本，日本皇太后給我寫了几首和歌，那時吉岡的話是我最順耳的時候。

“皇太后陛下等於陛下的母親，我如同陛下的准家屬，也感到榮耀！”

他那時對溥傑說：“我和你有如手足的关系。我和皇帝陛下，雖說不能以手足論，也算是手指與足指关系。咱們是准家族呀！”

但是到1936年前後，他的話有了變化。這時他每天必到，我接見外國人時有他在旁“侍立”，他認為我該對什麼人講些什麼話，也由他預先在紙條上寫好。每年一次“軍管區司令”會議或“省長”會議的宴會上，那是必定要叫我講一次話，以示“鼓勵”的。在他寫好的台詞上，免不了的是這類“協和語”：“努力日滿善，作皇軍的一翼”，“一心一德，達成大東亞聖戰”，“斷乎支援親邦聖戰”等等。我可以見什麼人、不可以見什麼人，都由他決定。關於我祭祀祖先的事，關於各處陵寢的管理，田莊收入的处理，北京家族誰能來看我，他一概都要管。起先，我還能看到外面寄來的信，帝制以後，一封也沒有了。他這時最常說的話就是：

“日本猶如陛下的父親，嗯；關東軍是日本的代表，嗯；關東軍司令官也等於是陛下的父親，嗯！父親的意思是要聽的！哈！”

日本軍隊前綫景況越壞，我的輩分也越低，後來他竟是这样說

的：

“关东軍是你的父輩，我是关东軍的代表，我是拿你当作自己的兄弟看待的！ 嗯！”

有的书上說，吉岡和我的关系极亲密，这话也許是根据我对他的言听計从，向来不敢違犯一句說的。这也是实情，原因就是我怕关东軍怀疑我，而关东軍是靠吉岡来了解我的。

七七事变后，关东軍对我的監視特別加紧，如限制关內亲戚来长春，檢扣我的信件，等等，原因是防止我和北京天津的王公旧臣們連結起来，共謀在关內复辟，这是不符合他們分而治之的方針的。其实，这时我已經不敢存这个幻想了。

吉岡后来每天进“宮”极为頻繁，也并没什么非談不可的事必須見我。有时来了不过十分钟就走了，走了不到五分钟又来了。去而复返的理由都是很不成道理的，比如剛才忘了說一句什么話，或者忘了問我明天有什么事叫他办，等等。因此我不能不疑心，他是成心想用突然襲击的办法来查看我在干什么的。

我应付他的办法，就是只要一听说他到，我立即接見，尽力减少他等候的时间，免他起疑心。甚至他来时正赶上我在吃飯，我也立刻放下飯碗去見他。对于他，我算做到了“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程度。

后来，我每次和他見過面之后，总是提心吊胆，不知其用意何在。因此当他一走，我必拿出銅錢来算一次卦，算算这次見面給我带来的是吉是凶。

我的恐惧

經過十四年奴隶生活的东北人民，家家都有一本血泪賬，都在

我裁可的镇压人民的伪满法令下，遭受到程度不同的牺牲。起初，日本人根据这些法令所制造出的惨案，我还听不到，因为郑孝胥、張景惠向来对我不谈这些，关东軍司令和我的御用挂吉岡安直更絕口不提。我从他們嘴里听到的和“滿洲国通信社”的新聞一样，都是“王道乐土”的描写，或者“扫蕩胡匪的赫赫成果”的报导。一直到1936年，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日本关东軍不但不想再瞞我，而且有时还故意要叫我知道一下。凌陞案就是一个例子。

凌陞是蒙古的貴族，前清蒙古都統貴福的儿子，他做过張作霖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和蒙古宣撫使的顧問，是第一批投靠日本关东軍的“滿洲建国元勛”之一。伪滿划东北为十四省时，他是第一任的兴安省省长。这年他剛和我結成亲家（我的四妹和他的儿子訂婚）。不久，我忽然听說他被关东軍捉了去。是什么原因，是死是活全不知道。我正感到十分不安，盘算着是不是可以向关东軍司令官植田謙吉打听一下，植田却先找我了。他像談論天气似的那么平常地对我說：“前两天关东軍特务机关处理了一个案子，这个人，皇帝陛下大概記得，是凌陞。他勾結外蒙（指蒙古人民共和国）图謀叛变，关东軍已經将他正法了。”

“已經正……法？”我吓了一跳，疑惑我耳朵听錯了。他的翻譯官連忙重复一遍：“正法，不錯，杀了。”植田也癢笑一下，点头說：“这是杀一儆百，陛下，應該杀一儆百！”

我吓得目瞪口呆。植田走了之后，我要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吉岡的意思，告訴人赶快把說好的这門亲事退了。

一連許多天，植田的“杀一儆百”在我耳边响着，我不住地揣摩它的含义。我早听人說过，日本关东軍是最多疑的，总在疑心“滿洲官員”是不是在反对它。而我也是个多疑的，总在疑心关东軍不放

心我。我不由得回忆起到东北后的一连串经历，从逛公园被宪兵包围起，一直到最近不准许我接见“大臣”，我肯定这都是关东军对我提防的表示。因此，我越想越觉着植田的“杀一儆百”这句话不妙。我怕他说这话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后来，给我当过英文翻译的吴沅业失踪了。听说他被调到驻东京的伪满使馆后，因为和美国使馆有来往，被日本宪兵逮捕。再后听溥杰说，这个翻译曾托监狱的看守带信出来给他，说他受的折磨实在忍不住了，求溥杰找我想办法救他，如果救不了，索性让他早点死，免得继续受罪。溥杰没有答应，因为他明白，如果他真的向我转达了，不但无效反而会挨我一顿骂的。

有一天，我的“警卫处长”佟济煦愁眉苦脸地告诉我，日本人正在哈尔滨附近建筑一个秘密工程，在将近结束时，将劳工全部秘密消灭，以图保密。他有个亲戚也是劳工之一，万幸地逃了出来。这件工程据我后来在战犯管理所和别人一起判断，大概就是平房区的日本细菌部队。当时虽然还不知道这个惨绝人寰的魔鬼事业，但成批消灭劳工也足够骇人听闻的了。可是我听了这个消息，唯一的反应就是嘱咐佟济煦千万不要和别人说。

然而我越怕牵累，事情却又像故意找到我头上来。有一天佟济煦心神不宁的和我说：“咱们的护军，好像很遭关东军的忌。”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精神恍惚地说：“没发生什么事，可是我总觉着要有事情发生似的。”

佟济煦的担心，我是明白的。所谓护军，即在宫内担任警卫任务的军队，这不同于“军政部”统辖的宫内“翊卫军”，是由我自己直接供应和组织的一支三百人的部队。当初我建立这支部队原来有个用意，我想用它培养出一批军队骨干，以便将来建立自己的武装